

谁调动了临武警察“抢尸打人”

临武官方做出这样的蛮横、暴力的举动,其胆子之大、手段之狠、立场之错位,实在让人震惊。警察打人一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公众期望,那些动用警力对付老百姓的人,要为其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

>>评论员观察

□本报评论员 赵雨

湖南临武瓜农与城管发生冲突死亡一事不断发酵,18日凌晨又曝出“警察抢尸”事件。央视网驻湖南记者曹晓波发布微博称,他接到死者家属电话求助:警方出动200多人,手持电棍、伸缩式警棍、盾牌冲锋至人群。现场多名群众受伤,两辆记者采访车被砸伤。

对此事件,临武县政府一负责人解释说,死者死亡

的地方是闹市区,“尸体肯定不能长时间放那里,加上家属情绪比较激动,警察要过去维护秩序,有部分家属可能去阻止,这个过程肯定会发生冲突。”这样的说法当然不能服人。出动大量警察持械对付普通老百姓,显然已经超出“沟通不畅”这样的范畴,方式严重错误,大大激化了矛盾。临武官方做出这样的蛮横、暴力的举动,其胆子之大、手段之狠、立场之错位,实在让人震惊。

在这起事件中,临武官方一错再错,使自己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。17日上午,临

武瓜农邓正加在与城管的冲突中死亡。死者亲属和目击者反映,城管曾对死者进行围殴,并用秤砣重击死者头部。“城管打死卖瓜小贩”的消息在当地迅速传播,引起群众强烈不满。而当日下午,临武县委、县政府主办的临武新闻网发消息称,发生一起意外死亡事件,称城管在执法过程中与邓正加发生争执,“邓正加突然倒地死亡。”在没有尸检结果、死者死因未明的情况下,临武官方使用“意外死亡”这样的描述,十分草率和随意,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,都让死者家属

和一些群众认为,这是为暴力执法的城管人员撇清责任,因此激化了矛盾。

此后临武官方的举动更让人震惊。18日凌晨,在临武闹市区出现了警察持械追打群众的场面。按照当地的解释,警方动员家属将尸体由闹市区运回家中,由于沟通不畅,发生了一些冲突。但是从现场照片及媒体报道来看,这样的解释明显是轻描淡写。既然是“沟通”,为何有大量警察持械出动?多人流血受伤的冲突,到底是谁挑起,谁制造?这些,当地政府敢给出个答案吗?

酿成现今的局面,不只是能力问题,恐怕更多是态度问题。中央早有要求,面对群体性事件要慎用警力、善待群众。2008年,当时的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明确指出,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现场秩序,化解矛盾,制止过激行为,防止局势失控。工作中,坚持“三个慎用”(慎用警力,慎用武器警械,慎用强制措施),坚决防止因用警不当、定位不准、处置不妥而激化矛盾,坚决防止发生流血伤亡事件。临武的做法与此背道而驰,把群众当

成敌人一样打压,显然是把自己当成了老天爷,忘了公权力从何而来、为谁使用,权力观、是非观出现了严重的问题。

18日下午,临武县长贺遵庆表示,将依法依规、公开公正处理瓜农死亡一事,“如果调查发现城管队员与邓正加死亡有关、存在暴力执法等行为,将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相关责任,绝不姑息。”这种表态还远远不够。公众期望,那些动用警力对付老百姓的人,要为其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

>>公民论坛

嫁女摆宴收钱,底气从何而来

□钱凤伟

近日,河北省贫困县涪源县平定堡镇党委书记岳树旺,在涪源县一酒店办嫁女喜宴,其间收取成礼礼金。(7月18日《新京报》)

身为镇党委书记,嫁女喜宴之前,应向有关部门

报告。然而,这位书记更知道的是,有关部门的监督和规章制度的制约,根本就没有必要放在眼里。规章制度就如一纸空文,监督名存实亡。县纪委官员就为这位书记辩护,“岳树旺朋友多,出嫁请客是习俗。”

显然,如此铺张的喜宴

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,从中折射出的,是监督的软弱、滞后、被动、缺位。当手中实权在握的官员已不把监督制约放在眼里,有关职能部门首先难辞其咎。在失去监督和制约以后,权钱的互相作用,必然还会使类似这样的排场越做越大。

“官员挂职民企”是走回头路

□陈怀瑜

重庆选派40名官员到民企挂职并将建“官员进民企”长效机制,其中18人任副总裁、副总经理,18人任总经理助理,4人任部门负责人。(7月18日中国新闻网)

走群众路线,这也许就是重庆推动“干部进民企促发展”活动的本意之所在。只

不过貌似“利好”之下,更多隐藏着风险与弊端。

官员临时性挂职民企,能做到权责利分明吗?——政企不分之弊,其实早已明晰并有定论。现在重庆将“挂职民企”形成长效机制,显然有违“政企分开”的原则。

再者,官员挂职是短暂性的,占据了民企重要领导岗位和资源,也不利于企业

自身的管理人才培养。作为代表政府的官员,民企不可能像对待自己员工一样严格管理和约束,若挂职官员出现经营管理失误,企业估计也不敢对官员追责。

事实上,官员做好本职工作,就是最好的为人民服务。走群众路线,何必一定要走“政企不分”、“官商不分”的回头路呢?

急救服务不该有“辖区围墙”

□李英锋

7月16日晚,上海奉贤区新四平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,一对年近六旬的夫妻被车撞倒后不省人事。由于事发地点位于奉贤区和浦东新区交界处,两区的急救中心“踢皮球”,最终,事故中的两人一死一伤。(7月18日《东方早报》)

在严重的交通事故面前,时间就是伤者的生命。急救中心可以依托政府的行政区划设置一个基本的辖区,以便明确急救责任提高效率,但急救的辖区不应该是僵化的、绝对的,在辖区的边界处绝不应该有不可逾越的围墙,而是要以救助民众生命为最基本的标准。

在遇到紧急情况时,民众只有求救的份儿,没有权力确定病人或伤者归哪个急救中心“管辖”。这种延误暴露出接线人员的冷漠、反应的迟钝,也暴露出急救指挥分派机制的僵化。建立一个反应迅速、调度科学、服务高效的急救中心,建立一个统一指挥协调机构,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为善不只是“好心车主”的事

>>齐鲁视点

□吴金彪

火车马上就要开了,两个年轻人却一直打不到车去车站。心急如焚的时候,一位女车主主动招手将两人免费送到了火车站。更让人“心灵触动”的是,好心帮忙的女车主并不顺路。(本报今日A09版)

事不大,却很温馨。遇到别人着急赶路,载他们一程,把他们送到目的地,确实是举手之劳,正如车主刘女士所言“这是小事情,不用在意”。但这样的小事在如今社会却显得弥足珍贵,因为扪心自问,这样的“小事”我们很多人都做不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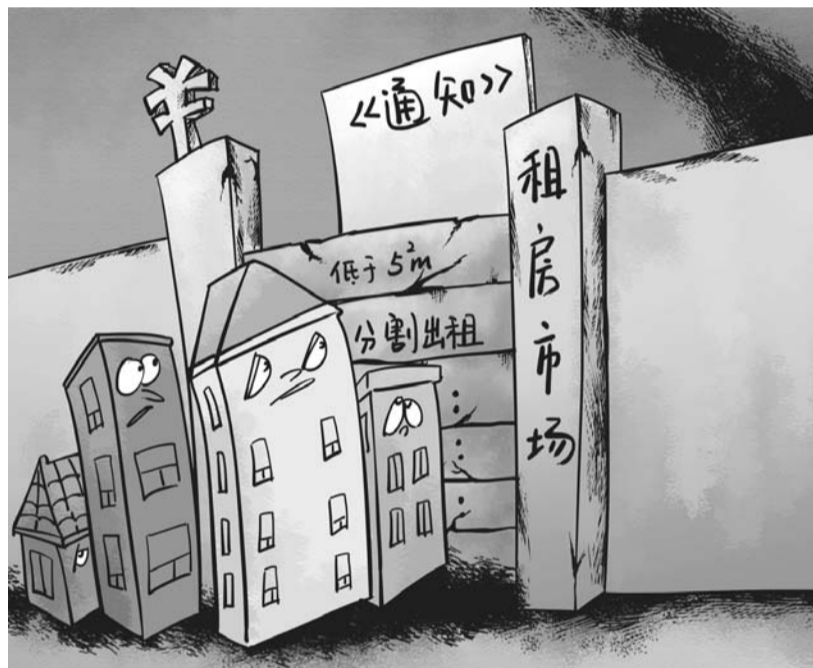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,城市高峰时段打车难已不新鲜。眼望着路口的人拼命招手却打不到车,很多私家车主的选择往往是疾驶而过,哪怕不忙,也很少有人停下来问问。一个更加普通的例子是,大街上陌生人问路不得,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陌生人问路的地方,用手一指或者说一句话即可,然而却装作没听见,匆匆而过。

“善小不为”似乎总有一堆理由:社会环境不好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万一惹上麻烦怎么办?惹不起还躲不起吗?当下社会的一些“阴暗面”以及一些让好人伤心的事似乎也支持了“善小不为”者的观点:一瘸一拐的乞丐得到路人施舍的钱财后站起来健步如飞地跑了,好心人扶起摔倒

的老人后却被冤枉……

这些人和事在“透支”着我们的善举,但不能让它们“搅动”了我们的为善之心。因为社会中还是好人多,帮助别人,在让被帮助者感到幸福的同时,自己也会收获快乐。“我为人人,人人为我”,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生活的环境。“以后有人遇到困难,我还愿意帮忙。”好心女车主驻的那一刹那可能根本没有想太多,也许在她看来,“能帮就帮”已经成为一种习惯。试想,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像女车主一样形成这种“能帮就帮”的习惯,我们的社会环境又会发生什么变化?

善小可为。在为女车主鼓掌的同时,我们是否也能做点什么? (作者为本报记者)



画评

提高门槛

北京住建委、规划委、公安局、卫生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,明确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标准。通知规定,北京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,单个房间不得超2人,不得按照床位出租,厨房、卫生间、阳台和地下储藏室不能出租。(7月18日中新网)

看上去很美的政策,很难有现实层面的可操作性。北京动辄数万元一平方米的房价,低收入人群是想都不敢想的,就连租房也只能是合租,否则只好选择离开。真正的问题是,底层收入者往往是从服务行业的外地人,北京真的要歧视并驱赶他们吗?

好的出发点并不是判定良策与否的标准。城市之大,大在包容;城市之现代,更是理念和服务的现代。

文/宋鹏程 漫画/曹一

>>媒体视点

好的政策需要“一任接着是一任干”

必须承认,经济环境的变化,市场资源的调整,群众利益的日趋多元,会令许多政策遭遇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的挑战。民生一头连着政府的公信力,一头连着百姓的切身利益。那种“新官不理旧政”的思维,那种动辄“朝令夕改”的做法,不仅削弱了政策的执行力,还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。

发展的关键是让市场有信心,让百姓有盼头。以往定下的发展思路、发展规划和政策举措,如果符合民众长远利益,就当“一任接着是一任干”。一句话,干部想把信任留下,须得强化保持政策连续性的意识,也得锤炼运作可持续性政策的能力。

一个好的经济政策,应该具备自我执行的惯性;一个好的政策设计机制,也应该具备自我调适的功能,并不会因人事变化产生巨变。如果执政过程中都能严格按照程序办事,依法行政,那些“翻烧饼”的政策必会

少许多。

从另一个角度看,即使是民生善政,如果缺乏现代理念和先进制度的配套,也会影响善政本身的执行效果,也会让民生产生“政策随人走”的印象。长此以往,不仅会消解群众自主创造财富和活跃市场的积极性,甚至造成投资失败找组织不找合伙人、经济不振问市长不问市场的现象。(摘自《人民日报》,作者曹鹏程)

问题是,房价上涨多年,已是民怨沸腾;此前业已证明,地价再涨,最多也只是够够偿还地方债务的利息,如果地价下跌,地方债务就面临破产的危险。谁都已经看出来,现有以卖地为主的城市发展模式,已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

跳出单个城市,上升到整个国家的高度,那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。如果说依赖卖地是一个城市转型的最大障碍,那么房地产就是国家经济转型的最大障碍。在它身上,几乎凝结了过去20年经济发展方式的所有弊端。

这么说,并不是全盘否认或割掉房地产的意思,而是说,过往的房地产调控方式,不可再持续,该反思的要反思,该纠正的要纠正,该刺破土地债务泡沫的就要赶紧动手。去年11月以来,大家就望穿秋水,非唯土地或房地产一隅,可供挥霍的时间不多了。(摘自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)

经济转型的最大障碍

土地抵押贷款的高额数字,再次直接证明了地方债务数量的惊人。无论地方债务总额是13万亿还是20万亿,根据6月10日的国家审计署的报告,95%的城市都承诺以土地收入来偿债。

推论是:地方政府本质上没有降低地价的动力,也没有调控房价的动力。虽然市长、区长想尽可能卖地还债,但净地却越来越少。这就涉及拆迁。而地方政府往往既想拆迁快,又想补偿少,所以屡屡酿成恶性事件。

■本版投稿邮箱:
qilupinglun@sina.com